

让英雄主义融入当代精神

□汪守德

模,这类英雄式的写作虽然存在着被过度提纯的弊端与不足,形象与内涵的单一在后来受到垢病,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处于胜利狂欢之中的人们那种巨大的心理与情感需求。

而进入新时期的军事题材文学,对英雄主义的思考和表现则更为理性和深邃,这与随时代应运而生的思想解放和激情创造的时代氛围密切相关。其中引人注目、且好评不断的作品,有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朱秀海的《穿越死亡》、邓一光的《我是太阳》、马晓丽的《楚河汉界》、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项小米的《英雄无语》、袁山山的《我在天堂等你》、柳建伟的《突出重围》等,形成了集体突进的壮观阵容。由于其写作的自觉建立在更为文学性的基础之上,既以英雄主义为其不变的精神底色,又使英雄品格水乳交融地兼有与人物的七情六欲的丰富特征;既以思想性的表达视为遵循的原则,又将作品的意味作为终极的追求,使所树立起新的英雄形象不再那么概念,而是真正脚踏着坚实的大地,具备了可贵而可喜的时代生活和民族性格深度。无论是历史留下的伤痕,还是现实导致的种种困境,抑或是必须面对的精神沉重,英雄的精神比以往更具直叩读者心灵的分量。

然而,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随着创作的发展,对英雄主义的态度出现了分流的现象。虽仍有一些作家保持惯见的思维,在表现英雄上向前迈进,甚至于出现了如都梁的《亮剑》中李云龙这种性格极度张扬和夸张的人物,无论从人物塑造还是文学欣赏的角度讲,都可以认为是开辟和引领了一种不同于以往、别开生面的审美风尚。但也出现了某种非英雄化的倾向,虽然其外延并不仅限于军事题材,但对军事题材创作影响却不容小觑。其显而易见的特点是创作者不再愿意把军人作为英雄来描写,而以写实主义的立场描绘当代军人的真实生态,让人看清其生存的实际状况与艰难处境。因而在此类的作品中常常充斥平凡、琐碎、庸常,甚至令人绝望的生活细节与场景,我们这个时代仿佛被一种弥漫着的灰色调所遮盖,不再是激情迸发、英雄辈出,英雄原有的崇高、伟岸、非凡等特性也被质疑,英雄人物的真实性、感召力和影响力更是大为褪色。许多多这个人物的出现,或可视为对这类创作取向的效法与折返,其生活经历与心理现实均有极强的生活逻辑与根据,又有为人们肯于接受的英雄性。这也契合了当今颇为流行的接受趋势,即人们宁肯喜爱与相信那些从平凡甚至是低贱的位置上站起来的人物,如果说他们可以被称为英雄的话,这样的英雄才最有血肉、最有亲和力,最能打动人心。这一切似乎对待英雄主义呈现出较为多样的创作格局。

从上面的简要的描述,可见军事题材

文学的英雄主义是在不断探索发展的。英雄主义的写作在目前之所以面临某种困难的局面,与时代失衡的思想情绪和价值判断不无关系,目前尚未看出驱散这种迷惘与困惑的迹象。非英雄化的创作倾向和主张的出现,源自于对固有传统英雄观的审视、反思与总结,颠覆传统、解构崇高的非英雄化的审美旨趣,使文学与英雄共同回归世俗与人间。毫无疑问的是,军事题材作品中的英雄形象,理应更加具有人间的气息、人性情的魅力和真实动人的力量。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主义,其审美特征更加能够贴近和体现时代的文学理念,他们看起来既可能是惊天动地的英雄,也可能是春风化雨的凡人,这样的英雄并非居于天上、天之外,而是接通时代的地气,沾满生活的泥土,有着灼烫的血肉,使人接近这样的英雄用的是平视而非仰视的角度。希望英雄回归人间,并非将英雄化为泡沫与虚无,而是归于英雄行为与精神的本真。如果在创作中有意无意地鄙薄、否定甚至彻底摒弃英雄主义,这样的探索 and 表现对发展军事题材文学就是毫无意义的。

无论在怎样的时代,都有属于自己时代的英雄,而这样的英雄也绝不应该遭到无端地冷漠。所谓英雄是一个时代奋斗意志和拼搏勇气的生动证明,是一个民族生命张力和创造能力的突出体现,是一个国家思想境界和精神高度的重要标志。如果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是以视死如归的浴血征战尽显英雄本色;如果在丽日青天的和平环境,则以面对和迎接各种挑战来折射其掷地有声的英雄性。无数英雄用他们的作为与生命写下的历史,不仅闪耀出人类文明进步的光亮,也规定了军事题材作品某种根本性的特质。即英雄与奉献、英雄与牺牲、英雄与崇高,这种如同自然天成、水乳交融的词汇组合,就是对英雄这一概念最高层级的诠释。文艺作品中的英雄形象,可能比生活中的英雄更具概括力、典型性和感染力,并赋予军事题材作品独具的思想情感和美学意义,对民族的精神建构与审美活动都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载体所张扬的英雄主义,是支撑起一个时代精神大厦的钙质与脊梁。而对英雄主义魂之所系的军事题材作品,倘若失去了这个应有的主旋律,其精神之柱就会坍塌,只剩下没有灵魂的躯壳。读者也会因其方向的迷失、价值的失范,而逐渐疏离这种原本曾十分热衷的题材。

显然在这个已发生了万千变化的当代,确有个怎样评判界定英雄、树立怎样的英雄观问题。若我们一成不变地按过去的标准来衡量英雄,则必然因思维的差池而造成受困顿;若以今天存在着的各种矛盾和迷乱现象,认为英雄主义已绝

缘于这个时代,则更会陷入某种荒谬的境地。应当研究和深思什么才是我们时代的英雄主义,谁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英雄,他们有着怎样的行为特征与精神特征。且不说过往历史上的英雄业绩及其精神遗产,仍然是远未穷尽的创作题材和价值选择,就拿我们随之一同前行的当代而言,社会生活的实质进步和军队建设的飞速发展,更是因为有多少人默默地进行着英雄般的创业和奋斗,在书写一部前无古人、可歌可泣的伟大史诗。假如一个高歌猛进的时代,困惑于暂时而表面的现象导致对社会本质和主流的误读,让英雄主义遗憾地缺席于我们的作品之中,那只能意味着作家的失职,并不能代表时代缺少值得可感天地、精神可鉴日月的无数真的英雄。

军事题材作品表现英雄主义,并非是让英雄脱离现实的根基去空洞地亮肌肉比臂力,假大空、高大全式的人物也早已被唾弃,真正的英雄主义必然是融合着时代特征与审美思考的,必然基于对当代精神准确的判断与把握。因此这样的英雄主义既是真实的、强有力的,又是理想的、具有超越意义的。英雄主义既与现实主义、又与理想主义相相生,所实现的是英雄主义的现代性和当代文学的英雄性特征,这能使时代的文学始终充满着激动人心的力量。当然这要靠作家以极大的热情,以卓越的创作力,对当下的英雄形象、英雄品格和英雄内涵进行清晰而富于见地的识别与刻画,表现他们的眼界与情怀、智慧与血性、创造与担当、奋斗与牺牲,让新的英雄人物从迷雾中走出来,成为照亮这个时代的艺术形象。

这其实也是对作家责任心和创作力的严峻考验,在纷乱的情感和种种的欲望面前,如果为利益所诱、为迷思所困,或精神萎靡、慵懒状态,或一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或与心有抵触、不屑一顾,是难以写出体现强烈英雄主义精神作品的。一个在风云四起、险象环生的世界求生存、谋发展的民族,英雄主义仍然是鼓舞信心、激励斗志的重要精神能源。作家作为精神产品的创造者,不是与己无关的路人和旁观者,必须从国家与民族未来的角度,从中国军事题材文学未来发展的角度,认清写好英雄主义作品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并且擦亮眼睛振作精神,潜下心来耐得寂寞,从时代的本质和人生的真谛上,去观察与辨析五彩斑斓的社会生活和军事生活,去识别和塑造具有鲜明特征的当代英雄,使之成为凝聚当代作家思想与审美贡献、汪洋恣肆而又文章灿烂的创作。既用以证明中国作家在军事题材领域思考的深刻性和情感的丰富性,更用富含营养的作品,给拼搏奋进的中华民族输入充足的正能量,并起到重塑一个民族精神与胆魄的有益作用。

任何试图通过一部分人的个人历史去反映某个时代的专著总会有遗珠之憾。当刘慧试图用将近30年来军事文学作家的访谈,展示作家这些在身后那段个人奋斗及命运遭际的岁月,又同时展现曾经让我们多少人为之激动、欣喜和慨叹的文学年轻时,它不可能把对那段历史作出过自己独特贡献的全部军队作家一网打尽。

看到这部书中列出的长达29人的名单时,我会想起李瑛、徐怀中、胡石言、刘亚洲、李存葆、刘兆林、简嘉、程步涛、李晓桦等等一长串未列入名单的名字,而正是这些人与列入本书中的人一道构成了完整的当代军事文学史。这不是刘慧的错,这是由于种种这样那样的条件所限。因为任何一部想把一个时代一网打尽的著述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非你是太上皇,毕其一生精力于一书。即或如此,刘慧的努力已经令人叹为观止,她几乎仅凭一个人的努力就把近乎大半在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史上活跃的人物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庆幸自己差不多认识甚至熟悉这名单中的每一个人,我庆幸与他们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并且与他们一道为构筑这个时期军事文学的大厦贡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但这是仅就我个人而言。而事实上,正在我们这一群人中,诞生了像莫言这样令国人为之骄傲的作家,他为这支军队和这个国家贡献的不仅仅是片砖只瓦,而是整整一段大厦的屋脊。而在其身后,周涛、朱苏进、都梁、周大新、朱秀海、麦家、徐贵祥、柳建伟、宋学武、唐栋、苗长水、项小米、袁山山、马晓丽等作家也大大地热高了军事文学殿堂的屋梁和基座,同样为军事文学争得了荣誉。还有韩静霆、王海鸰、石钟山这些因其出色的小说作品改编为电视剧而为军事文学带来巨大社会反响的作家。而以小说发轫、后又以纪实文学名扬文坛的王树增、李鸣生则与他们不同凡响的作品使军事题材的此类作品不输于其他写同类体裁的任何一位地方作家,甚至比他们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提到我始终情中的一个文学门类:诗歌。在这片天地中,朱增泉、王宗仁、王久辛、刘立云也以其不凡的身手支撑起了军事文学大厦的一角。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增泉,他在吟咏自己独树一帜的诗歌之外,又将笔触伸向了军事历史笔记领域,使我们在中国军事历史的正史之外,又获得了溶历史和文学于一炉的观察视角,拓宽了军事文学作家的视界和领域。

我同样关注比我这代作家稍晚进入这一行列的作家:陈怀国、李西岳、温亚军,他们同样以各自不同的人生及从军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军营生活充满独特魅力的角落。

在这里还需要格外提及的是朱向前以及在本书中没有出现的其他文学评论家的名字:陆文虎、黄国柱、周政保、张志忠、汪守德,他们对当代军事文学的贡献同样是巨大的,甚至难以估量的,因为正是他们充满理性和热情的品评与扶持,使上述所有的作家获得了自信 and 信心,也使他们得以在自己的文学道路上脚步坚实,越走越远。

一句话,我以与这些人同代、同行为荣。

当刘慧的这部作品付梓之时,从遥远的北欧传来了莫言荣获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佳音,让我和我的这些同代人们由衷的欣喜和骄傲,这是莫言个人的天才与努力应得的荣誉,也是对这一代军队作家乃至中国作家30年奋斗成果的一次充分肯定,更是西方人对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确认。可以这样说,没有莫言的个人努力,没有这一代与莫言同行的作家的奋斗,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整个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

让我们为莫言自豪,也为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国家自豪。特别是当今世界需要中国在巨大的经济成就之外向他们证明自己的另一种文明,或者说软实力时候。

还要感谢刘慧,正是她的执著和辛苦,使本书中每一位作家有机会回顾或反观自己的人生与创作,也使读者们有机会走近或触摸这些作家心灵的星空;看到过去或现在,这些“星宿”曾以怎样的色彩和亮度闪耀过或继续闪耀,并构成中国当代文学天幕上一条璀璨的星河。

这本书将向读者一一再现这群绿色星宿的攒动轨迹。而这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读刘慧《光荣序列》

□乔良

当绿色的群星闪耀时

前有着较大不同,但无论文学观念、审美旨趣,还是批评理路、文体风格,甚至文化理想、精神气质,都体现出一种内在的统一性。不可否认,这也为傅逸尘进一步返身观照自己在军旅文学批评上的进展和局限,探索建立自己的批评园地,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参照系。

除了良好外部条件,傅逸尘的成功离不开自己的努力。每次朋友闲聊小聚,兴致一高傅逸尘便会回忆昔日伏案苦读的时光,无论是蒙在被窝里读书读到眼泪恹恹的故事,还是风雨无阻泡军艺图书馆的经历,都让你强烈地感受到这是一个与同龄人截然不同的“书虫”。青年作家王凯曾撰文回忆与傅逸尘一同买书的故事,感叹他“常常带一买就是十几、二十本,害得我还得帮他往回拎”。作为在场者之一,我亦对这段往事记忆犹新。同住招待所的我们几人中,傅逸尘的宿舍最“乱”,一眼望去全是买的书籍和杂志,让你无从下脚。但你又确实感佩他的勤奋刻苦,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和所剩无几的个人时间里,他能把精力和时间全部投入 to 读书和写作上。古语今来,读书多者为稻粮谋,谁得读书真意趣,傅逸尘想必是这其中少数得意趣者之一。

除了勤奋刻苦,傅逸尘的成功还在于他的坚持。文学批评是一种智性写作,才情、智慧固然重要,但最为关键的还在于下苦功夫、工夫夫,没有“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很难有所收获。军艺毕业后,傅逸尘成为解放军报社的一名编辑。与象牙塔优越单纯的学习研究环境相比,工作之后的傅逸尘变得忙碌起来,他先是在报社某记者站工作了一年时间,之后又随船出海执行任务,在大洋之上漂泊了半年有余,回来后工作也并不轻快,经常要去外地出差、采访,现在他又续写了新的任务,奔波于各地采访创作。然而,这些都没有妨碍他对文学批评的热爱与坚守,他总是 一个背包、一台电脑,走到哪儿就把书带到哪儿,走到哪儿就支起电脑写到哪儿,将色彩斑斓的年华和天南海北的思绪,都化作文学的思涛,淋漓尽情地挥洒。正是勤奋与坚持使傅逸尘成为阅读新世纪军旅文学作品最多、取得理论批评成果最多的军旅批评家之一,而要论起对当下军旅文学、军旅作家乃至整个军旅文学生态的了解程度,也无人能出其右。可以说,文学批评成就了年轻的傅逸尘,但更为重要的是,傅逸尘之于军旅文学和批评的重要意义:他不仅赓续了军旅文学批评历久弥新的精神品格,而且以自己的努力发展了军旅文学批评的道与术,形成了能有效、全面对话新世纪军旅文学的批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新世纪军旅文学批评黯然失色、严重失衡的整体面貌。

时光飞逝,从发表第一篇批评文章算起,傅逸尘已在 this 片原野耕耘了近10个年头。欣喜的是,光环之下他没有一笑而过,而是将绚烂归于平淡,始终目光清澈地聚焦于军旅文学之中,卓然独立,持续发声,保持着活跃的战斗状态。虽然他在军旅文学理论批评上的成绩已超越了年龄的载荷,但我始终认为,他的批评之路才刚刚起步,无论理论高度、思想锐度,还是研究深度、涉猎广度,亦有很大提升空间。“花未全开月未圆”,我们对他还有太多的期待。当然,繁荣军事文学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心愿,希望更多有志之士加入到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的行列中,“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一如既往地坚持批评的严肃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拿出更多有深度、有信度、有力度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热爱的军队文学事业贡献绵薄之力。

傅逸尘和他的军旅文学批评

□周徐

书”(2008年卷),2012年受聘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无可争辩地站在了军旅文学批评的最前沿,当之无愧地成为最为活跃的新锐军旅批评家之一。有论者形容他“像是一个刚出场的接力赛队员,强有力地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进行了一棒出色的传递”。

二

傅逸尘的理论批评视野开阔、洞察敏锐、持论严谨,既有史料考证、文本剖析,又有理论思辨、精神审视,呈现出经过系统学习和文本训练的“学院派”风格。品评他的理论批评文章,你能感到扑面而来的诚意、新意和真实。

诚挚,是每一个从事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的学人所共有的特点,傅逸尘亦是如此。作为一名军人、一名报社编辑,他对于文学更多的是一种油然而生的喜爱,对于军旅文学批评更多的是一种忧心烈烈的担当。在他看来,“真正的文学批评从来都不应该成为作家作品的附庸,真正的文学批评从来都不应该伴随着文学的堕落而沉沦,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引领着文学的发展、预示着未来的方向,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秉承着对文学的热爱和对人类的关怀,超越功利,探索艺术的真谛,阐发文学的价值,建构一个属于文学与批评自身的温暖、自由、高贵、和谐的公共场域和精神家园。”也正因为如此,他敢于坚定持守自己的批评标准和独立的批评品格,既勇于直陈己见,又绝不攻诘辩难;既毫不吝惜地“灌溉佳花”,又切中肯綮地“剪除恶草”,始终以诚挚的态度与作者、读者交流。

所谓新意,是指傅逸尘具有独到的批评眼光和敏锐的文学触觉,始终置身文学现场,时刻关注军旅前沿,善于从新的文学力量和文学现象中透视军旅文学的发展方向,善于运用新的批评话语探索文学批评新的可能性。他率先以军旅长篇小说为研究支 点,逐步展开对“新世纪军旅文学”的整体研究和现象阐释,建构起一个新颖的理论研究和研究平台;他及时窥见当下文学及精神状态的世俗化、欲望化趋势,大声疾呼“重建英雄叙事”;他强调“开放的现实主义”观念,在“技”与“道”的双重维度下探讨军旅文学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他对“军旅文学叙事理论”的准确概括以及别开生面的解读,开辟了新的阐释话语,保持了文学批评的“现场感”和“有效性”。与此同时,出于对传统军旅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的稔熟,傅逸尘积极尝试在承继传统军旅文学感悟式批评、阐释式批评、作家本体批评、社会历史批评等基础上,引入伦理批评、接受批评、文化诗学批评等话语,使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的话语空间得到极大扩容。雷达说:“这是一位很值得重视的评论新人,‘80后’,文学硕士出身,却已发表了大量文章。真诚、坦率,视野开阔,其中对新时期以来军旅文学的研究、对话;对现实主义的阐发;对‘英雄话语’的思考,均有探索意义。”山东师范大学张丽军教授称赞傅逸尘的批评“蕴含了与上个世纪军旅文学批评完全不同的新质,一

种崭新的面貌,更具现代性的开放意味”。

所谓真意,是指傅逸尘始终聚焦当下军旅文学具体问题有的放矢,从不矫揉造作、隔靴搔痒,更不会左顾右盼、言不由衷地说些场面话、违心话。应当承认,当下时代有的“批评”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广告宣传和讨好市场的话语泡沫,批评家很难不留情面地对文学作品“亮剑”,市面上连篇累牍的批评文章,也难免沦为丧失自由精神与独立品格的匠人文字,抑或成为不及物的空泛议论。傅逸尘深感当下的“文学批评在凌空蹈虚中孤芳自赏而不能自拔,理论的狂欢离鲜活 的文学与作家渐行渐远”,期望文学批评“回到文学自身,回到文学的细部,回归批评家单纯、质朴但却真实、有力的感觉”。他为学不做媚时语,总是一针见血、直击靶心;他多次撰文对具体的作家作品进行鞭辟入里的剖析和点评,直言不讳其中的局限和缺失,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一些“名师大家”和“金玉之作”的质疑,甚至给予凌厉的否定;他对日益影视化与世俗化的军旅长篇小说给予了早期预警,并对一些不良倾向进行了猛烈抨击;他多次呼吁请关注当下文学中的“伪现实主义”倾向,强调守望生活“现场”的“有难度的写作”,他甚至坦言自己2005年之后的军旅文学批评总体上由“建构”转入了“解构”……这些充满血性和钙质的文字,昭示了文学批评在魏紫姚黄、各臻其态的时代那本初的情性和魅力。惟其如此,批评才更像批评,才能始终葆有自己的灵魂、不失前行的方向。

三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批评。傅逸尘的脱颖而出,既是时代的选择,也得益于他最充分地做好了准备。傅逸尘出身文艺世家,在父母的将文学下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并在父亲的悉心指点下将文学批评作为自己的主业。大二那年,他评论长篇小說《楚河汉界》和散文集《大河遗梦》的两篇练笔之作意外地发表在《文艺报》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其鼓舞是怎样的巨大可想而知”。傅逸尘就这样不经意间敲开了文学批评的殿堂之门。

梁实秋曾说过:“伟大的批评家,必有深刻的观察,直觉的体会,敏锐的感觉,于森罗万象的宇宙人生之中搜出一个理想的普遍的标准。这个标准是客观的,是绝对的。应用的文学批评只是这个绝对的标准之演绎的应用。”帮助傅逸尘追索并建立起这一“理想的标准”的,正是他的研究生导师朱向前。朱向前是军旅文学研究的大家,他对傅逸尘颇为了解也极为赏识,“傅逸尘确实让我眼前一亮,很直觉,我认为这是一个可造之才”。从本科开始,傅逸尘便时常去听朱向前的课,积极参加他创办的“红星论坛”活动,当然也不会放过与朱向前把酒论文的机会。可以说,在朱向前的悉心指导下,傅逸尘从一开始便具有了在深远历史背景下和宏阔文学视野里对军旅文学进行深入研究 的优越条件。不仅如此,傅逸尘与朱向前之间已然形成了一种精神血脉与文化品格的传承。虽然傅逸尘的文章在气势与格局上与朱向

与军旅文学走过的辉煌历程相比,新时期才正式起步的军旅文学批评,无论规模、实绩,还是作用、影响,都稍逊一筹,长久以来总逃不开“一只失衡的车轮”形象。虽然各级界一直不遗余力地呼吁、引导和扶持,但千呼万唤鲜有来者。一方面,批评家的成长既要有良好禀赋,又需长期的学习积累,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尤其面对新世纪文学的快速变化和多元竞生,批评家的情、识、才、学更是缺一不可。另一方面,军队没有职业批评家,文学批评也无利可图,但凡甘于此在这一寂寞园地里默默耕耘者,或因为由衷喜爱,或出于勇敢担当,或缘自职业关联,没有对军旅文学的赤子之心、笃定之志和浩然之气,绝不可能掘一口深井。此外,军队是一个武装集团,军人从事文学批评要有良好的外部条件,身处基层部队的文人从事文学批评爱好者,由于时间、条件、信息、岗位等方面的限制,成长起来并不容易。所以,我们不忍心苛责军旅文学批评的孱弱,也深知成就一个军旅批评家实非易事,更不是拔苗助长可得。

进入新世纪,本就有 些先天不足的军旅文学批评领域更显萧瑟之感。放眼军队内部,虽然陆文虎、朱向前、汪守德、陈先义、韩瑞亭、丁临一等前辈批评家苦苦支撑,但“后不见来者”的危机日益凸显。一个颇能说明事实严重性的事件是:当以长篇小说为代表的一大批军旅文学作品竞相涌现,掀起一波浩荡的军旅文学新浪潮之时;当以“70后”为代表的 一批新生代军旅作家崭露头角,带来一派蓬勃的军旅文学新气象之际,由于军队理论批评队伍人才凋敝、青黄不接,导致这些新人新作的高下文野乏人品评、成败得失少人问津,批评对创作的引介、引导和引领作用几近丧失。一时间,人们对军旅文学批评“缺席”、“失语”、“枯竭”的指责甚嚣尘上,更对军旅文学批评的未来忧心如焚。朱向前不止一次地感叹:“君不见,军艺文学系从1984年创办至今近30年,培养的作家人数以百计,但主要从事理论批评的,连我在内也就两三个人,军旅文学理论批评后继无人早已不是‘狼来了’的戏言”。

就在此时,傅逸尘不卑不亢地冲撞而入。他接连发表《裂变与生长: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论纲》《新世纪军旅文学:坚守与突围——关于新世纪军旅文学的对话》《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等极有分量的论文,连年盘点和评述年度军旅文学创作,不仅别具一格地描绘出新世纪军旅文学“裂变”与“生长”的整体景观,而且对新世纪军旅文学的文化语境、发展态势、叙事伦理、审美旨趣、艺术成就、创作局限等进行了深入阐释和论析,及时填补了新世纪军旅文学研究的空白。人们一下子记住了这个翩翩少年,也看出了他的有备而来,毕竟没有几年扎实的案头功夫和对军旅文学的勤读博览,断然不能发起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的立体攻击。

傅逸尘受命于军旅文学新浪潮勃兴之际,凭借7年军艺求学打下的坚实功底,一鸣惊人,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他以新世纪军旅文学为主阵地,将当代军旅文学作为研究的主攻方向,一步步爬梳与掘进、解析与建构,短短几年时间阅 翰数万、成果渐丰,先后在《文艺报》《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山花》《小说评论》《当代文坛》等报刊,发表理论批评文章80余篇,40余万字,出版文学评论集《重建英雄叙事》并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从